

目 录

云南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汇编	(1)
西双版纳考古拾零	(19)
关于白族地区二牛三夫的耕作方法	(22)
云南部分民族原始制陶工艺的再次考察	(29)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和西盟佤族原始制陶调查	(33)
曲靖董家村石范铸造 调查	(36)
孟定傣族的原始造纸	(42)
大理三塔出土的古代纺织品	(48)
傣锦工艺调查	(54)
傣族的纺织工艺与彩锦	(58)
云南彝族的“作花”工艺	(63)
博南津与霁虹桥	(67)
大理古城址调查	(79)
滇西民族地区的几处古城址	(86)
景洪允景维遗址调查	(91)
云南思茅元代整控江摩崖调查	(97)
麻栗坡大王岩崖画	(103)
大理三塔塔藏写经	(112)
云南少数民族民居建筑简况	(117)
云南少数民族的竹编	(127)
云南民族实用器物的造型与装饰	(129)
后 记	(135)

云南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汇编

李昆声

本文系七、八年前我进行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综合研究时，为研究工作的方便而编写的一个资料性东西。它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按区域汇编的调查、发掘、清理报告。在该部分中，有些是直接引用报告原文，而大量的是将原报告经过整理，变成较系统的资料。对这一部分中每一地区新石器文化所作的简短结语，多为本人的一些研究心得；第二部分为云南新石器文化所反映的原始社会面貌；第三部分为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及其与我国其他原始文化的关系；第四部分为云南新石器文化的族属。这部分是作者多年来对云南新石器时代各有关问题的专门研究与论述。为了适合这本资料集的要求，在发表之前临时加了一个标题，叫“资料汇编”。本来是供自己写论文时参考的一些素材，现承宋恩常、朱德普两同志美意，提供出来，以供民族、考古、历史学者进行研究时参考。如有引用不妥之处，请检索原发掘、调查报告。主要参考书目已开列于文末，以供查对。

一、云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原始资料

(一) 滇池地区

滇池是我国西南第一大湖，也是全国第六大淡水湖。湖岸线长150多公里，最大湖水面积330多平方公里，流域面积2960多平方公里。滇池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东岸土地广阔、肥沃，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很适宜古代居民在此从事农耕、渔猎活动。

1953年至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对滇池地区进行考古调查中，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20多处。其中比较重要的遗址，在滇池沿岸有17处：官渡、石碑村、石子河、古城、团山村、石寨山、河泊所、渠西里、兴旺村、后村、老街、白塔村、白塔山、黑林铺（原报告说遗址在昆明十四中，遗址地点命名为海源寺，不妥。今改为黑林铺）、乌龙铺、安江、象山。在这些遗址中，距滇池最近者（团山村）仅有150米，最远者（白塔村）为6公里。多数遗址都分布在滇池东岸。

此外，距滇池较远，但仍属滇池地区的遗址有江川头嘴山、螺螄山、光山遗址；安宁王家滩遗址。

滇池沿岸遗址分布情况如下：

第一种情况，分布在平地上的遗址

第一种类型，遗址分布在平地上，螺蛳壳堆积成小山，如官渡、河泊所、兴旺村和老街等遗址。面积最大的老街遗址，约500×130米；堆积得最高的河泊所遗址，高约8米。此类遗址的特点是螺蛳壳堆积较高，而且往往暴露在地表面，极引人注目。

第二种类型，遗址也分布在平地上，但螺蛳壳堆积并未形成高堆状，也没有大量暴露在地表面，文化层是深灰色的松土，其中夹杂少量螺蛳壳。此类遗址保存较好，如白塔村和后村等遗址。

第二种情况，分布在山上的遗址

第一种类型，分布在高约9至17米的小山上，如团山村和渠西里等遗址，保存尚好。

第二种类型，分布在高约33至45米的山腰中，如白塔山和石寨山。此类遗址的螺蛳壳堆积暴露在地表面，但堆积不高，也不太引人注目，保存情况也还好。

遗址最明显的特征是普遍存在螺蛳壳堆积，江川头嘴山、螺蛳山、光山遗址和滇池沿岸遗址情况相同。滇池沿岸遗址中每个螺壳尾部均有一个被敲通的小孔，表明捕捞螺蛳是当时滇池沿岸居民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取食螺肉的方法是敲破螺蛳尾部，这种古老的方法一直沿袭至今。

遗址的文化内涵包括陶器、石器和骨器。遗物以陶片为主，石器次之、骨器再次之。

陶器有下列三种：

1. 泥质红陶，占80%以上，陶质差，器壁厚，火候低，均为手制，制作粗糙，口缘上常有手捏痕迹。用稻穗、稻壳作垫，故可在陶器上看到稻穗、稻壳的痕迹，有的还可以看到稻壳。器形简单，有凸底浅盘、平底小碗和卷边小碗等，器底有同心圆圈纹饰。

2. 夹砂红陶，一般轮制，少数手制，以白色螺蛳壳作掺和料，陶质较差。器形有侈口罐、直口罐、盆、钵、釜、圈足器等。纹饰有小方格纹、斜方格纹、草叶纹、斜线纹、点纹或由人字纹、斜十字纹组成的图案。除小方格纹为印纹外，其余均为划纹。

3. 夹砂灰陶，手制或轮制，以螺蛳壳细末作掺和料，器壁薄。器形有侈口罐、带流罐、圈足器和器盖等等。纹饰有斜十字纹、波浪纹、小方格纹和斜线纹等，均系划纹，有的表面磨光。

以上三种陶器在各遗址中多寡不等，其中石寨山、河泊所、白塔山等处，以泥质红陶为多，夹砂红陶少见，制陶技术比较原始，大约是比较早的遗址。另一些遗址的泥质红陶较少，夹砂陶较多，器形较大，制作也较精致，时代应当较晚。

在江川头嘴山、螺蛳山、光山遗址采集到的陶片，和上述三类陶器的质料、花纹、器形特征均一致。而且，在泥质红陶器的器壁也夹有稻壳和稻穗芒痕迹。

石器种类有石斧、石锛、细腰石锤、砺石、石锥、石敲砸器、石刀形器等。石器磨制较多、打制较少。

本区石器最有特色的是有肩有段石锛。如滇池沿岸采集的一件，安宁王家滩遗址采集的一件和江川头嘴山遗址采集的一件有肩有段石锛，就是滇池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重要的文化特征。以江川头嘴山有肩有段石锛为例：“灰绿色砂石、磨制精细。器身扁平，正面平直偏刃；背面上段断面呈长方形，中部右边有一道装柄系绳的浅沟痕迹，往

下微微隆起，两侧肩部凸出，弧刃。长6.3、刃宽6.9、厚2厘米，与广东海南岛陵水坡村遗址出土的石铤较为相近。”而本省其他地区没有此类石铤。此外，与广西左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有肩有段石铤也比较接近。

本区有肩有段石铤、有肩石斧与洱海地区不同，洱海地区的多为梯形和扁圆柱体形石斧；本区石斧与滇西北维西县发现的磨光石斧亦无共同之处。

本区陶器中，富有特色的手制泥质红陶器在洱海地区、滇东北地区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新石器遗址中均未发现过。就器形而言，本区80%以上的陶器是平底和凸底小碗、浅盘。而洱海地区多带流器和带把器；滇东北地区多小平底带耳瓶。就陶器纹饰而言，本区以划纹为主，洱海地区则以断线压纹为主。而遗址中大量的螺蛳壳堆积亦为本区之特有现象，在本省其他地区，甚至同为湖滨的洱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不见。

综上所述，滇池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与本省其他地区有别、自成体系的一种文化。由于磨制石器大大多于打制石器，它不是本省较早的新石器文化，但遗址本身应有早晚之分，含泥质红陶较多的遗址，从陶器制作技术和器形的单一起来看，应当较早。而含夹砂陶较多的遗址，因为陶器制作较好，器形大，纹饰复杂，应当是较晚的遗址。

本区遗址中出土的石器以石斧、石铤为主，晚期遗址中所出夹砂陶器形大，种类多，纹饰精美，表明遗址先民们已经进入早期农业阶段。从陶器上稻壳、稻穗之痕迹可知，经营的农作物主要是稻谷。而从遗址濒临湖泊、有大量螺蛳壳堆积和每个螺蛳壳尾部均被敲通，遗址中还出陶网坠等情况判断，捕捞是遗址居民们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螺肉是食品的一个重要来源。

从遗址的各种现象进行综合分析，滇池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一种以捕捞、渔猎和农业结合的一种史前文化。

（二）洱海地区

洱海位于滇西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面积约200多平方公里。洱海水域大部分在大理县境内，一部分在洱源县境内。洱海海拔2000米，西岸是一块长条形的冲积平原，背负横断山脉之点苍山19峰，这些山峰自南而北为斜阳峰、马耳峰、佛顶峰、圣应峰、马龙峰、玉局峰、龙泉峰、中和峰、小岭峰（观音峰）、应乐峰、雪峰、兰峰、三阳峰、鹤云峰、白云峰、莲花峰、五台峰、苍琅峰、云弄峰。主峰中和峰海拔4000米左右。每两峰之间，有溪水向下流入洱海，共18溪，自南向北为阳南溪、葶苈溪、莫残溪、清碧溪、龙溪、绿玉溪、中溪、桃溪、梅溪、隐仙溪、双鸳溪、白石溪、灵泉溪、锦溪、茫涌溪、阳溪、万花溪、霞移溪。东岸无冲积平原，“其滨海处多陡峻壁立，一部分山陂作插向海内之势。”湖水较深。新石器时代遗址多分布在西岸点苍山脚下之台地上，东岸遗址较少，一般分布在湖边小岛和半岛之上。经调查，洱海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有30多处。

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于1938年11月至1940年6月在洱海沿岸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15处，即：马耳、佛顶、马龙、龙泉、小岭、三阳、鹤云、莲花甲址、五台、苍琅乙、丙址、中和甲址、下关西、虎山、捉鱼村。解放后调查或试掘的遗址有：五指山、中和、余家田、小岭、双鸯村、鹤阳、上关及东岸的海潮河、双廊、赤文岛、鹿鹅山、金

梭岛，以及距离洱海较远的祥云清华洞遗址。此外，零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片和石器的地点也很多。

马龙遗址

马龙遗址位于大理城西南8里马龙峰下山麓之顶部，北邻龙溪，南滨清碧溪，高出洱海约300米，东距洱海约7里，本址俗称诸葛营。

遗址地层分6层，而文化层以时代而论，可分4层。沙与灰土为第1层，浅灰土为第2层，深灰土为第3层，黄灰土为第4层。第1和2层属早期；第3和4层属晚期。

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均系夹砂陶，以夹砂橙黄陶为主，在第4文化层中发掘出的此类陶片不下10万片。器形有罐、碗、盆、皿、瓶5类，并有类似匝形的带流器。陶器系手制和慢轮相结合。即用泥条盘筑法制器底、器身，用慢轮制器物口沿、颈部。器壁厚薄不等，最薄者3厘米、最厚者23厘米。陶器纹饰可分为14种，有圆点纹、圆圈纹、直线纹、横线纹、斜线纹、斜方格纹，和由斜线或斜方格组成的横带纹、波纹等。陶器之外，有陶质纺轮和纺坠38件，型制分5式。第1式：车轮形，10件，华北常见器型；第2式：圆锥形，2件。第3式：带圆角之梯形，9件。第4式：算珠形，1件。第5式：似第3式而腰部变细，10件。

石器计553件，但完整者仅30件。石器质料有片岩、千层岩两类。石器的主要形式有：

斧：分2式，略近长方形和略近三角形。

铤：似斧而小，斜刃，不对称。

凿：分3式，窄长条圆体形、扁平梯形、一端开刃的天然石片。

刀：分4式，长形直背、长形曲背、半月形、长方形。

在这些石器的应用中，斧在早期占首要地位，后渐衰微。刀在晚期地位较为重要，凿有随时代而渐增的趋势，铤在早、晚期均较普遍。

马龙发现人类居住遗址，属早期的有穴居式住房2处，属晚期的有平地结棚住房3处。

半穴居住房之一系椭圆形土坑，南北长6.4米，东西宽5.7米，坑底为生红土，底上平铺几块石头，坑内填满红灰土。该穴居住房位于斜坡上，而坑底位置呈水平状态。

半穴居住房之二系长方形土坑，长约6米，宽约4米。

这两处半穴居住房均为本遗址早期居民所居住，以土坑为居室，以坑周围生红土为墙壁，房屋顶棚之建筑材料无从推测。因发现柱洞太少，顶棚式样亦无从判断。

平地起建住房3处，其中2处发现半圆形灰土平面，直径为3.4米长的一处住房内发现柱洞5个；直径为3.2米长的一处住房内未见柱洞。另在黄灰土层底生红土层上发现柱洞6个，组成直径3.5米之半圆形。这是该遗址晚期人类居住房屋。这种房屋系平地结棚而居，根据柱洞，知道屋顶棚是圆形的。此类房屋比早期的半穴居住房要进步一些。

遗址内发现很多炉灶遗迹，可分为4式：1式，在平地上置两块或数块石块为灶；2式，在平地上掘坑，坑内布石为灶；3式，在半穴居房屋土坑内掘一个椭圆形小坑为灶，此灶坑一端深、一端浅，浅端上便可置放炊具；4式，列数石于平地上，成桌凳形，

在旁炊爨。

以上4式炉灶在早期遗址中都有，而在晚期仅有1式。此外，在遗址早期文化层中发现窖穴4处，晚期窖穴2处，共计6处。窖穴的直径与深度均在0.7至1.1米之间，窖穴的位置在房屋内或旁边，大约是储藏粮食、果实或柴薪之窖。发掘时，窖内含大量木炭屑和陶片，此窖穴在储存物品时，又作抛弃垃圾之场所。另外，遗址位于斜坡之上，还发现了一些人工所筑的2至4级之阶梯，是遗址居民为行走和取水之便所筑。

佛顶遗址

分甲、乙址，1939年发掘。位于佛顶峰下大井塆村西之山脚及缓坡上。南有无名小溪，北有莫残溪。甲址高出洱海湖面280米，乙址高于洱海湖面460米。

遗物有陶器和石器。

陶器有碗、罐、瓶、带流器及网坠。陶器制作方法、陶色、纹饰多具有马龙遗址早期陶器之特征，然火候更低，形制、纹饰较简单，且无使用转盘之痕迹。

石器有斧、锛、凿、刀、砺等。锛、凿形制与马龙遗址相同。

在遗址中并发现平台、半穴居遗址、炉灶、窖穴等。

佛顶甲址年代与马龙早期相同或略早，而乙址早于甲址。本址与马龙遗址相比较有原始与进步之别，然仍属同一文化。

龙泉遗址

1939年12月发掘，位于大理城西龙泉峰下，北邻中溪、南邻绿玉溪，高于洱海300米。

遗物有陶器和石器。

陶器和马龙遗址1、2、3式陶相同。

石器共发现11件，计有斧、锛、凿、刀等。

该址内还发现平铺石块的居住面。

本址年代与马龙晚期相当。

宾川白羊村遗址

这是洱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典型村落遗址，本世纪七十年代经云南省博物馆进行了科学发掘。“遗址位于宾川县东2公里的宾居河滨，文化层堆积厚达4米多，是我省发现的文化层堆积最厚的遗址。”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之特点是圜底器多，有圜底罐、圜底匝、圜底钵等，其中圜底罐使用范围很广、延续时间也很长，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

白羊村遗址中出土数量较多的是半月形穿孔石刀。石斧、石锛形制一般为扁平长条形、椭圆形和梯形。还发现11座住房和排列规则、分布密集的圆形窖穴，可能是储藏粮食的仓库。遗址所反映的社会经济面貌以农业为主。其中共发现墓葬34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16座无头葬，这反映了何种社会现象，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对宾川白羊村遗址各种现象作综合分析，它和滇池沿岸各遗址又有所不同。

洱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普遍存在的石斧、石凿，其形制与中原地区一些新石器遗址中的出土物有相似之处。但从陶器多带流器、带把器、圜底器，断线压纹和大量刃

部开于弓背的半月形穿孔石刀来看，已构成本区新石器文化的特色。因而，洱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既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有联系，又自成体系的一个区域性新石器文化。

（三）滇东北地区

1954年发现的马厂遗址位于鲁甸县文屏公社马厂村周围。马厂村位于一座小丘陵之上，周围是一片沼泽，古代人类生活的遗物和树木都被埋入沼泽之中。

采集到的遗物有：石铤 2 件，一件通体完好，刃部很陡。另一件平面略成梯形，此类石铤在昭通常见。

陶器 9 件，有碗 2 件、单耳小罐 2 件、平底瓶 1 件、带盖瓶 1 件、单耳小瓶 1 件、敛口罐 1 件、勺形器 1 件。

马厂遗址出土文物与滇池地区、洱海地区不同，富有代表性的单耳细颈小瓶在云南别的地区均未发现过。

闸心场遗址距昭通城 12 公里，附近是丘陵地带。在闸心场西面约 130 米处，紧接着小米寨村北面，有一片开阔高地，南北约 400 米、东西约 500 米，在高地中心和北面断层边缘，发现 3 个地点暴露出陶片。第 1 地点堆积较厚，面积也较大，共有 4 层堆积：第 1 层，耕土，厚 6—30 厘米；第 2 层，黄灰色沙土，厚 48 厘米；第 3 层，黄色胶土；第 4 层，黑色胶土。在黄色及黑色胶土中，各夹有一层密集的陶片和少数石器，厚约 10—40 厘米。这两层陶片不相连接，陶片极为破碎。

在出土陶器和石器中。石器 4 件，1 件只残存上半段，似为斧类，其余 3 件基本上完好。石铤两件，大的一件呈梯形，双面刃，刃的斜度不完全对称。小的一件较为窄长，两面刃的斜度对称。另有 1 件扁圆形石器，磨制极精，发现时已残缺。

在探沟中掘出 300 多块陶片。除 2 件外，其余都很破碎，不能复原。从残片上看，泥质橙黄陶最多，其中少部分有平行划纹和点线纹及粗弦纹，多施于器物口沿及肩部，器形有平底侈口罐及瓶类，其次为灰陶，颜色不纯。器形多为长颈单耳小瓶，和马厂遗址相同。比较完整的器物有 2 件，其一为平底侈口罐，系泥质橙黄陶，口壁有粗弦纹 3 道，腹部稍鼓。此类罐在马厂遗址中也有，多数都有单耳，这件因上端缺了一块，不知原来有耳否？单耳小瓶 1 件，泥质红陶，因火候不均，部分表面呈红黄色。侈口、细颈、鼓腹，腹下端逐渐收缩为细圆柱状，小平底，耳已缺。此类瓶在马厂遗址中较为普遍。

闸心场新石器文化与马厂虽同属一个类型，但陶器的型式似乎没有马厂多，烧造技术也差一些。而且纯色陶器少见，多为红灰间杂。马厂陶器有一部分涂过一层黑色陶衣，这里陶器不知有否？目前尚未发现这种作法。从陶器上看，它的时代可能比马厂遗址稍早一点，根据昭通地区的历史沿革来看，其下限不会晚于战国以后。

云南全省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先后已发现一百多处，大部分集中在滇池地区和苍洱地区，马厂遗址的调查和闸心场的试掘，使我们对滇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和特色有了一些认识。从器物上比较，这里没有出过石刀和石铤，常见的是梯形石铤，陶器以带耳小平底瓶和侈口小罐为最多，而在滇池和洱海地区没有发现过这两种器形。陶器的纹饰种类不多，比较常见的是平行划纹和粗弦纹，滇池地区的各种划纹和洱海地区断

线压纹在这里尚未发现,洱海地区的橙黄色陶及滇池地区的泥质红陶在这里都没有发现。闸心场虽有许多陶器外表呈红黄色,但胎内仍为灰色,马厂陶器中有少数表皮极黑、打磨光亮,在滇池地区也不见。由于遗址发现较少,器物发现也少,对于滇东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全貌,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工作后才能再进行全面分析。

(四) 西双版纳地区

在澜沧江下游的西双版纳地区,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或地点6处。

“勐腊县发现石器地点二处,其一是西距县城22公里的大树脚,出土石器6件,器形有斧、犁、矛等;其二位于卡比寨公路附近,出土石斧、残陶罐各1件。此类陶罐,傣族至今仍在使用的。”

“1962年8—9月,在景洪镇附近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处:曼蚌因、曼运、曼景兰、曼听。

四处遗址皆位于澜沧江西岸的第二层台地,地势稍高,靠近水源。文化堆积很厚,最厚的地方达两米左右,并且有一定的层次关系,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骨器和贝壳等。

曼蚌因遗址,位于景洪正北一公里处,座落在澜沧江边。遗址北部已被江水冲塌,破坏严重,南北残存200米、东西宽300米。南部较平坦、为曼蚌因村所在地。地层如下:第一层耕土,黑褐色、土质松软,厚15—20厘米,遗物有陶片、瓷片和砖瓦等。第二层浅灰土,质尚疏松,似冲积过,厚40—100厘米,出土遗物较少,有磨制石器和陶片等。第三层黄色土,土质较紧,夹有姜石,厚80—120厘米,并有约长2,厚0.1厘米的火烧土面,以上部平整、光滑。遗物有打制石器和陶片等。以下即为生土。

采集遗物共35件,其中石器29件。这些石器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多出自第三层,都是由附近采集来的砾石打制而成,主要石料为辉绿岩,也有黄砂岩和板岩,一般未经磨制,但也有明显的打制和使用痕迹。器形主要有石核石器、敲砸器、尖状器、石片和石斧。石斧多为长条形、皆打制。还有渔网坠。另一类石器皆出自第一、二层,这些石器经打制成型后,再进行局部或通体磨制。石斧2件,均为长条形。1件通体磨光。盘状器2件,以扁砾石制成,多有使用痕迹。研磨盘1件,研磨棒2件,皆为圆柱形砾石,其中1件尾端有冲击痕。石网坠5件、体形较小。石环1件,剖面呈等腰三角形。

在断崖相当于第二、三层地层中,挖出四块陶片,陶片之间无差别。陶片多夹砂,有灰陶和褐陶二种。手制,陶质坚硬,内壁抹平,外部素面,间有方格纹和绳纹。除了陶罐和陶碗外,还出土1件完整的陶网坠,夹砂红陶,筒状。有1件可以复原的器盖。

曼运遗址是位于曼蚌因东南1公里处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东部被江水浸刷,今已无存,残长约300米、南北近700米。曼运村座落在遗址的西部和南部。文化堆积厚60—80厘米。可分两层:第一层耕土,黑褐土,内含陶片和瓷片等。第二层深灰土,土质较紧密,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骨器和贝壳。

石器只见到石网坠,均在扁长形的砾石上打击两腰而成。其中有些网坠很大,大的长25.6宽、11.8厘米。这种大网坠仅在1平方米内就可采集10多件。

骨器有骨锥2件,1件用骨片做成,尖部经磨制。另1件削制,有烧痕。骨凿1

件。残骨器1件，呈筒状，已残破，一端有刀削痕迹。贝壳7件，背面均有手工磨制的孔。目前该地区的傣族、佤族、布朗族和哈尼族尚有饰贝的习俗。

曼景兰遗址距澜沧江两岸1至2公里，位于景洪县城东部，范围较大，北至景洪旧街，其中心地区压在曼景兰村寨下边。文化堆积遭雨水冲刷，保存不佳。采集的石器有石斧2件，为扁圆和有肩两种，前者粗糙，是用扁圆砾石打制而成，柄窄，刃宽。锄1件，呈梯形，刃部较锐利。网坠1件。此外，有陶碗1件，泥质黄褐陶，制作粗糙。

曼听遗址距澜沧江西岸1至2公里，位于曼景兰东南，分布于景洪通往宣慰街道路两侧，但为后代遗存所破坏。仅采集石斧2件，其中1件为长方形，柄部残缺。石铤1件，通体磨光。

除以上4处遗址外，还在宣慰街、景德和勐罕等地采集到一些石器。西双版纳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主要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宋兆麟教授在本世纪六十年代进行的。

景洪附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与云南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不同，而与思茅、孟连等地遗址有相似之处。

1963年，云南省博物馆马长舟同志在西双版纳附近的孟连县鹰嘴岩斜坡上发现并清理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老鹰山遗址。

马长舟同志在清理报告中指出：遗址东靠老鹰山岩削壁，南北长10米、东西宽3.5—5米。当时人们利用天然岩穴居住。文化层堆积较厚而单纯，共分四层：第一层为扰土，呈浅黄色。第二层为文化层，呈黄灰色，厚0.3—1.5米。第三层为棕色土，出土文物与上层相同，但有大量的螺壳、蚌壳。第四为生土。

遗址出土物有：石斧2件，其一制作粗糙，用红砂石打平一端与一侧而成；另一形制较小，平面呈梯形，用绿色页岩打后制成。刃部光滑。网坠35件，多用椭圆形砾石于两侧打出对称缺口而成。残纺轮一件，扁平圆形。

生活用具有陶器，夹砂灰陶较多，夹砂红陶次之。能辨认器型有罐、钵、碗、盘等。主要为轮制，个别手制。纹饰以划纹为主，粗绳纹、波浪纹与划旋纹次之。划纹的表现形式多变，有粗有细，直施、横施或横直交叉与斜线交叉等。

综合勐腊、景洪、孟连三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内涵，发现这三处遗址出土遗物相似，加之三处遗址地理位置相距不远，可以认为它们属于同一文化。

（五）金沙江中游地区

1971年，在金沙江中游的元谋县元马公社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其后，由云南省博物馆组织发掘，并举办了一期文物考古训练班，先后参加发掘及实习者有数十人。后来，由阚勇同志执笔写出发掘报告。

根据发掘报告，将大墩子原始社会村落概貌描述如下：

在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内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角器、牙器、蚌器等遗物，并发现房屋15座、墓葬37座、火塘7个、窖穴4个及稻谷炭化粉末。

石器有斧、铤、刀、凿、镞、印模、纺轮、环、镯、弹丸、石球等。

石斧共138件，其中圆柱体石斧、尖柄石斧是本区有代表性的器物。

石镞共172件，均系磨制，有6种式样，以扁平石镞最有特征。

石镞85件，有半数都保存得较完整。

石刀16件，一种为长条形，一种为半月形。均有双孔，刃部既有开于“弓背”者，也有开于“弓弦”者。

石凿33件，长条形，通体磨光，多数完整。

陶器，多出于墓葬，质料则以夹砂陶为主，其中夹砂灰褐陶最多，约占80%，其余为夹砂橙黄陶和夹砂红陶。均为手制，火候不匀。

陶器器形较丰富，有罐、钵、盆、瓮、壶、瓶、杯等。其中罐、瓮最多。陶罐有大口罐、小口深腹罐、高领罐、小罐等。还有一些圈足器、带耳器，但未见三足器。

房屋遗迹15座，早期房屋12座，晚期房屋3座。

早期房屋均为长方形，平地起柱的木结构建筑。居住面是在自然地面之草泥土上铺灰烬、纯黄土踩踏而成。个别地面还抹草抹泥。墙基四周挖沟槽，在沟底再掘柱洞，栽上木柱，填土于沟内。墙壁系一种木胎泥墙，里外两面涂草抹泥，经过烘烤而成。房顶是稍作倾斜的平面结构，用木椽紧密铺垫，多平行排列，外表亦涂草拌泥成为屋顶，屋顶亦经烘烤，厚约15—20厘米。

晚期房屋的居住面建于早期灰土堆积之房屋废墟之上，墙壁和屋顶建筑方法和早期房屋相同。

墓葬37座，均属晚期。其中竖穴土坑墓19座，埋葬成年人。瓮棺葬17座，圆坑墓1座，埋葬幼童。

竖穴土坑墓葬式较为复杂，有7种葬式：仰身断肢葬、仰身直肢葬、仰身屈肢葬、侧身葬、侧身屈肢葬、俯身屈肢葬、母子合葬，有些墓葬的主人是被石镞射中而死亡的，中箭部位有上肢、胸、腹、头、下肢等。

本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与黄河流域有较多关系，如房屋建筑方式，与河南镇平赵湾仰韶文化房屋、洛阳王湾第一期文化（仰韶文化）房屋相似。幼童使用瓮棺葬，且埋于住房周围，母子合葬等却与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相同。

本区村落遗址内出土的一些陶器，如以平底深腹大器为特点，陶质、纹饰上与四川礼州遗址相似，石器中磨制石斧、镞、凿、鏃等也与礼州遗址同类器物相近。

综合本区遗址内出土遗物的各种特征，我们认为，云南金沙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受黄河流域影响，与四川礼州遗址相似，而又自成体系的一种地方文化。

（六）澜沧江中游地区

1973年12月云县忙怀农民发现忙怀遗址，云南省博物馆邱宣充同志调查并清理该遗址。

云县忙怀位于县城东北48公里处，遗址在忙怀村东半山腰上，有2个地点：旧地基和平掌。

出土石器140件，有斧、网坠、砧、印模。

石器中富有特征的是钺形、靴形、有肩石斧。均为打制而成，以河卵石为原料。网坠用砾石石片，打去两侧缺口而成。

陶器无完整器，仅11片陶片，皆夹砂陶，饰绳纹，可以辨认的器形有罐、钵、圜底

器。

本区靴形、钺形石斧与我国广西，国外越南同类青铜器有相似之处，这些青铜器的渊源可能就是本区新石器。

(七) 滇东南地区

1974年9月，麻栗坡县计委同志发现，1975年清理。

遗址位于麻栗坡县城附近的畴阳河西岸，系一个洞穴遗址，因为有一条溪水从洞内流出，文化层大部分已被冲刷，经在洞内开出一个16平方米的探方，在淤泥下就是文化层，土质为黄灰色，夹杂较多的红烧土粒和灰屑，厚80厘米左右。

小河洞石器以磨制极精的有肩石斧、靴形石锛和三角形石刀为代表。另外，还有梯形和长条形石斧、石印模等。

陶器无完整者，出土陶片302片，主要是夹砂灰褐陶，还有少数夹砂红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另有划纹，附加堆纹等。

(八) 滇西北地区

本世纪五十年代云南省博物馆熊瑛同志清理了维西县戈登村遗址。

遗址位于腊普河东岸。从采集到的文物看，与其他地区不同。

出土有陶器、石器、骨器等。

石器有石斧、石刀、石镞、石针、石饰品、石球等。石斧系磨光石斧。石刀有三种：长方形单孔磨光石刀，长方形磨光石刀，一面磨光石刀。

陶器有夹砂深灰陶器之器柄1件、夹砂深灰穿孔陶片1片、夹砂褐红陶网坠2件。

骨器有骨凿1件、磨光骨器1件。

二、云南新石器文化所反映的原始社会面貌

“新石器时代”一词出于希腊文“新的石头”。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差别是多方面的。这种差别不仅在于它是具有磨光的石器的时代。更重要的是，从工具、技术、经济生活到社会组织均有很大不同。

例如陶器的发明，即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的一大功劳，也是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群进入新石器时代氏族社会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陶器的发明，乃是新石器时代区别于旧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陶器的原料，粘土在地球上普遍存在，粘土烧造成陶器的温度——600℃左右，对于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来说，是不难解决的。云南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发明了多种多样的不同陶质、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陶器，以适应于本地区人们的生活。滇池地区为什么出现许多泥质红陶制的小碗、浅盘一类陶器？因为它们适于居住在滇池湖畔大量采集螺蛳的人们，用这种器皿来盛放螺肉无疑是很方便的。而洱海同样是淡水湖泊，也产螺蛳，但洱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并无螺蛳壳之类的贝丘遗

址，也不出或少见浅盘、小碗，这表明洱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是不食或很少食用螺蛳肉的。而洱海地区陶器中常见带把器和带流器，表明洱海地区的居民喜欢饮用一种流质或半流质食物。由此可见，在原始社会，陶器的制作是以实用和功利主义为目的的。

新石器时代用以制造生产工具的材料多样化，除石头外，还有骨、角、牙、木、蚌、陶、竹等等。如元谋大墩子遗址出土79件蚌刀，可见蚌器在该遗址中是广泛使用的。不仅材料多样化，而且，制作工具采用了许多新技术，如钻孔、裁断、琢打、砥磨等，其中尤以钻孔和砥磨应用广泛。金沙江中游地区，洱海地区，尤其是宾川白羊村遗址内出土为数众多的半月形穿孔石刀，其穿孔技术较高，多数是从两面钻孔穿透的。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只会使用震击的方法使石器崩裂，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普遍应用砥磨这一新技术来磨制石器，他们先把石料用打击法进行初步加工，如果加工成型一把斧，在砂岩或坚硬的砾石上把刃部和其他部位磨光。昭通闸心场出土的磨制极精的扁圆形石器，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加工的。由于磨光石斧的出现，使人们的工具锋利了，刃部宽大的石斧、石铤就能够把树木加工得更加精细，这样，人类就从旧石器时代的山洞中走出来，大规模地建造房屋，聚居在村落寨子中。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诸如元谋大墩子和宾川白羊村这样的聚落，以及聚落中建造得那么好的房屋了。

把石器和木把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到复合工具，如手斧、矛、弓箭、标枪等。这类工具的使用使新石器时代人们的力量大为增强。既然在新石器时代，斧、铤一类工具普遍安装手柄，但为何在云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又从未发现斧铤的手柄？原因是这些手柄均系木质的，极易炭化，所以都未能保存下来。江川头嘴山发现的一件有段石铤，通体磨光，正面平直偏刃，背面上段断面呈长方形，中部以下微微隆起，两侧肩部凸出，弧刃，器身中部有明显的装柄系绳痕迹。复原此器安柄方法，乃是用绳索捆绑石铤于树叉之类的手柄上使用。

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发明了农业，学会种植谷物。云南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滇池周围，曲靖马槽洞，耿马石佛洞，耿马南碧桥等地都发现了稻壳、炭化稻谷或稻的痕迹。根据对出土古稻、现代野生稻、古文献记载和种稻民族的综合研究，云南很可能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最早驯化野生稻的民族可能是百越民族的先民。百越族群的后裔——壮、傣、水、侗、黎、高山、毛难、仡佬、京、布依族今天在云南和我国南方的贵州、广西、广东、台湾等省区有着广泛的分布。不仅仅是种植稻谷或其他谷物，新石器时代的居民还学会了饲养家畜，正如恩格斯所说：它是“采用畜牧业及农业的一个时期，是已经学会用人类活动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一个时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元谋大墩子遗址中发现猪、狗、牛、羊、鸡的骨骼，经鉴定，猪、狗属于驯养的家畜，牛、羊是可能已驯养的家畜。应该指出，在云南新石器时代“六畜”品种可能尚不齐全。到了战国时期，祥云大波那铜棺墓中发现了猪、鸡、牛、马、羊、狗青铜模型，则表明战国时期云南“六畜”品种业已齐全。

新石器时代的居民，由于从事农业，饲养家畜家禽，使他们的经济活动从旧石器时代专门向大自然索取的“掠取经济”转变为了“生产经济”。此时，由于食物来源较旧石器时代稳定和较有保证，从而减少了死于饥馑的人数，人口也得到较大的增殖，社会组织有所扩大。所以，云南旧石器时代的地点仅在20多个县有分布，而新石器时代的

遗址和地点就猛增至100多处。但原始社会并不是某些人想象中的“太平盛世”。在新石器时代，生产力十分低下，仅靠农业和饲养业往往不能果腹，因此，人们必须从事捕捞、渔猎、采集，用以补充食物之不足。所以，在遗址中就大量发现蚌、鱼、螺、蜗牛、甚至黑熊、羯牛、豪猪等大型猛兽以及温顺的水鹿、赤鹿、麝和小动物松鼠、竹鼠等。在很多遗址中所反映的经济面貌是多种经营并存的混合经济。总之，地上长的，林中跑的，水中游的，湖中生的，天上飞的，无一不是新石器时代人类食物的来源。

在旧石器时代，由于物质文化的极度贫乏，所以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旧石器文化都缺少特点。而到了新石器时代，各个不同地区的地方特点就显得越来越突出，地区之间文化不平衡状态大大加深。由于云南全省在自然、地理、气候等方面，各地差别极大，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就显得不平衡和多样化，所以，我们能够把云南的新石器文化划分为8种不同类型，尽管如此，云南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祖国内地新石器文化还是有共同性，主要表现在受黄河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两大新石器文化的影响。

在社会形态上，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同属原始社会。但在社会发展阶段和组织上却是不同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人类的社会组织是原始群或称原始人群，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进入氏族社会——母系氏族社会。到了新石器时代则是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昌盛的时代，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当人类进入金属器时代后，伴随着父系氏族社会的解体，人类社会必然产生阶级，国家和私有制，从此进入了阶级社会。

母系氏族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子女血统以母方来确定。在中原繁荣的母系氏族社会仰韶文化中的西安半坡遗址，盛行母子合葬。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中也发现了母子合葬现象。

在原始氏族社会，氏族之间、部落之间常因争夺食物或较好的生存条件而发生械斗。这种械斗往往是十分残酷的，元谋大墩子遗址中很多中箭死亡的墓主，就很可能是一种械斗的牺牲品，有的人身中十数箭，这就反映了这种械斗的残酷性。

在原始社会，人类往往有许多形式的宗教观念，如自然崇拜、动物崇拜、植物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男女生殖器崇拜、图腾崇拜等等，这些均可以统称为原始宗教崇拜。

云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许多现象，反映了这些崇拜的存在。如元谋大墩子墓葬（15号墓）中有一位中年男性，葬式为俯身屈肢葬，发掘时，人骨架俯身，下肢微曲，右手垂直而左手捂面，这显然有一定的宗教意识支配着。此外，在大墩子，还有幼童瓮棺葬，以陶瓮作葬具，埋葬时，方向都一致朝西。而且，瓮棺的肩部、腹壁或底部都有意识地敲出1至3个圆形小孔，作为死者灵魂自由出入的孔道。这些瓮棺又往往埋在村落中人们的住房周围，体现了夭折儿童死后会时时得到母辈的“关怀”和“照料”。凡此种种，都是受宗教意识支配的行为，因为在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的思维判断能力也十分低下的时代，人类在生产实践活动中有很多方面是不能抗御自然力的。于是，愚昧和无知占了上风，为了解释种种自然、生理现象，维系原始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种种原始宗教崇拜现象也就应运而生。

在原始艺术方面，代表作是元谋大墩子遗址出土的一件鸡形陶壶。壶用夹砂陶制

成，整体象一只蹲踞的母鸡，鸡头两侧各装饰一枚圆泥泡，代表鸡的眼睛，鸡的身体用点线纹装饰，代表羽毛，尾部和背部各装饰三行圆泥泡，鸡尾微微上翘，显得栩栩如生。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三千多年前的原始艺术品。

三、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及其 与我国其他原始文化的关系

云南新石器时代遗址，就目前的发现来说，均属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经放射性碳14测定，元谋大墩子遗址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 1260 ± 90 年，树轮校正后的年代是公元前 1470 ± 155 年。宾川白羊村遗址内的第6号探方第3号房屋第2号柱洞内的木炭亦用放射性碳14测定，年代是公元前 1820 ± 85 年，树轮校正后的年代是公元前 2165 ± 105 年。这个年代可以作为洱海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参考数据。昭通闸心场所代表的滇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及滇池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磨制较精，陶器制作技术较高，打磨比较光亮。从陶器石器制作技术看，都比金沙江中游和洱海地区进步，它们的年代要晚于这两个地区。云县忙怀的石器制作原始，都是打制，澜沧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年代要早于洱海地区和金沙江中游地区。西双版纳曼蚌因遗址出土大量打制石器，同时出土的磨制精细的石器，本身有早晚的区别，较早的器物其时代早于白羊村遗址。

由于云南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面貌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所以，谈及云南新石器文化的特征，应对每一地区文化进行具体分析。简而言之，以石寨山类型遗址为代表的滇池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出土大量泥质红陶浅盘、小碗为特征，石器以有肩石斧、有段石铤及有肩有段石铤为特征。洱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从陶器方面说，以夹砂陶最多，器形以圜底、带耳和带流器为主，纹饰以断线压纹最为发达，少数陶器上有刻符。石器的特征是普遍存在开刃于“弓背”的半月形穿孔石刀，此外，有一种鸟翼形石刀在云南其他地区新石器文化中未曾发现过。以闸心场和马厂遗址为代表的滇东北地区新石器文化，陶器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多单耳、细颈平底小瓶和单耳侈口罐，有部分表面打磨极其光亮的黑陶器，为云南其他地区所不见。石器方面的主要特征是以梯形磨光石铤、少量有段铤为特点，与黔西北威宁、赫章、毕节等地所出者相近，应该是滇东北与黔西北地区的一种地方文化。滇南和西双版纳地区发现的大型石网坠，最大者长25.6、宽11.8厘米，在我国新石器文化中实属罕见。该区也是出有段石铤和有肩石斧的地区。以元谋大墩子遗址为代表的金沙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要特征是：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多罐、瓮一类平底深腹大器，纹饰以绳纹、篮纹和素面为主；蚌刀数量大大超过石刀，应用范围较广，特殊的葬式——断肢葬为云南其他地区所不见。澜沧江中游忙怀遗址的特点是没有发现磨制石器，从很少出土陶器等特征来看，遗址居民有可能以游牧为主。以麻栗坡小河洞遗址为代表的滇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以磨制精致的有肩石铤、靴形石铤和三角形石刀为代表，遗址中渔猎占有较大比重。以维西戈登村遗址为代表的滇西北地区新石器文化陶器作风与我国西北齐家文化、寺洼文化相似。

云南各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虽然各有特点，自成体系，但又受我国其他地区新

石器时代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受黄河流域和我国东南地区两大文化的影响。

关于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关系，黄河流域是我们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目前已知最早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是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两遗址距今8千年左右，遗址内发现了陶鼎、三足钵一类的三足器，而且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三足器。鼎类三足器作为华夏族创造的富有特征的古代文物，进入青铜时代的商、周之际，出现了大量铸造精良、纹饰繁褥的青铜鼎类礼器，使鼎类三足器成为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象征之一，成为区别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典型器物。在云南洱海地区的大理马龙遗址曾出土陶鼎、在宾川白羊村遗址内发现鼎足、三足钵的足和鬲足。而云南不仅是新石器文化，而且在后来的青铜时代墓葬、遗址中，都很少发现鼎类三足器。这种现象表明鼎类三足器是从别的地区传来云南的，具体地说，就是从黄河流域传入云南的。

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主要遗存。仰韶文化以磨光红陶和彩陶为突出特征，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陶器特征之一是圆底钵数量较多。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地区的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文化，在甘肃、青海大部分地区都有遗存，马家窑文化的陶色多为橙黄色和砖红色。滇中、滇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显然受到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强烈影响。在宾川白羊村遗址中发现的2万片左右的陶片中，有数量可观的夹砂红陶，而大理马龙遗址则兼有橙黄陶和红陶。元谋大墩子遗址内有一个探方内夹砂红陶占12.25%。以上遗址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圆底钵出土。

除圆底钵外，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基本器型还有尖底瓶、小口平底罐、长颈小壶、瓮、钵等。尖底瓶是仰韶文化富有特征的一种汲水器，元谋大墩子遗址出土一种侈口、细颈、鼓腹、小平底的夹砂红陶瓶，亦可定为尖底瓶。其器型与仰韶文化之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马家窑文化之尖底瓶相似，属同类器物。

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黄河中、下游的又一种主要的新石器文化，它对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有一定影响。如远古农业氏族使用的一种收割工具——半月形穿孔石刀是起源于龙山文化的。此类器物在云南大理马龙、祥云清华洞、宾川白羊村、元谋大墩子等遗址内均有发现。在黄河流域，半月形穿孔石刀均开刃于“半月”之内侧——“弓弦”上，洱海地区的半月形石刀则开刃于“半月”之外侧——“弓背”上，元谋大墩子既有开刃于“弓弦”者，又有开刃于“弓背”者。这说明云南在吸收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时，又有了适宜地方特点的创造。此外，龙山文化石器多数通体磨光，石斧较厚重，斧镑凿的数量一般较多，扁平石镞有相当广泛的分布等，也是云南洱海、金沙江中游地区新石器的特征。它如房屋建筑、瓮棺等等均有黄河流域色彩。

总而言之，云南洱海地区、金沙江中游地区、滇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受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影响较大。

而云南东部、南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又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同类文化有较多关系。我们可以从遗址类型、石器、陶器三个方面加以比较。

我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广西以及属于东南部的台湾省，广泛地存在一种以蚌、螺、贝壳堆积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统称为贝丘遗址。云南滇池地区的滇池、抚仙湖、星云湖等内陆高原湖泊周围，也有很多贝丘遗址；另外，在我国东南地区还广

泛分布着一些洞穴遗址和台地上的遗址；云南西双版纳、滇南孟连、滇东南也有洞穴遗址和河旁台地遗址。

在石器方面，我国东南地区新石器文化最富于特征的是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有肩石斧主要分布在两广地区，有段石锛主要发现于浙江、福建、台湾、广西、江西等省区和香港地区。云南新石器时代的很多遗址，不仅发现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而且在器型方面也颇为相似，如江川李家山一件有肩有段石锛与广东海南岛陵水坡村、广东潮阳同类器物相似。麻栗坡小河洞有肩石斧、靴形石斧和两广地区的同类器物相似。

在陶器方面，以江西、浙江、广西、福建、台湾五省区为例，陶质皆以夹砂粗红陶为主，纹饰大量是绳纹，其次有划纹、附加堆纹等；器形以圜底釜、罐为主，其次有钵、盆、壶、杯、碗、豆、器盖等。云南云县忙怀、孟连老鹰山、景洪曼蚌因、麻栗坡小河洞、保山马鞍山遗址与我国东南地区五省区早期类型新石器遗址陶器均有共同之处。如云南五遗址陶质皆以夹砂陶为主，纹饰有绳纹、划纹、附加堆纹、乳丁纹、方格纹、波浪纹等；器形以釜罐为主，其次为钵、碗、盆、杯、盘、器盖等，反映了这些遗址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古代文化有共同的渊源关系。

其他如种稻、居住干栏等都是云南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共同的古文化因素。

综上所述，云南滇东北地区、滇池地区、滇东南地区、西双版纳地区和澜沧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我国东南地区有较多的关系。

四、云南新石器文化的族属

在我们进行民族史研究时，追溯某一个民族的族源，一般都是从原始社会时期的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云南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在研究各个不同民族的起源、古代文化面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民族迁徙等理论问题时，无疑要借助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古代氏羌族群及其文化因素。第三部分里所谈到的黄河上游、中游地区的一种古代文化——仰韶文化，就是氏羌族群的先民们创造的新石器文化。西北古代文化——卡约文化就是《后汉书·西羌传》上记载的古代羌族的一支——析支羌创造的新石器文化，此外，寺洼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西北地区新石器文化都与古代氏羌有关。易言之，我国西北地区的几种主要的新石器文化，都与古代氏羌有关，或者说，主要是由氏羌族群的先民们创造的。云南洱海地区、金沙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房屋建筑（半穴居式住房和平地起建粘土木结构房屋）、瓮棺葬、陶器刻符、圜底钵、尖底瓶等文化因素方面，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相同。鉴于仰韶文化早于云南新石器文化二、三千年，只能认为这些文化因素是由北往南传播的。根据考古资料，大致可以指出这样的一条传播路线（仅仅是诸多传播路线中的一条）：西北原始文化（5、6千年前）——西藏昌都卡若文化（4、5千年前）——川滇大墩子礼州文化（3千多年前）。我们可以农作物粟为例子来加以说明，粟是传统

的北方耐旱作物，最早出现在7、8千年前的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内。而东南亚晚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了粟。显然，这是中国黄河流域发明的农作物南传的结果，沿着青藏高原东端的横断山脉的河谷往南传播，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发现了粟，恰恰证明了卡若遗址是传播过程的一个中程站。经济文化的传播是由人来进行的。那么，是什么民族传播了这些古代文化？（例如将粟从黄河流域传播到泰国），是氏羌。关于氏羌自北往南迁徙，在《后汉书·西羌传》上就有记载：“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獯戎。忍季父卯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十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这是先秦时期，羌人较大的一次南迁。其实，从考古资料看，氏羌族从西北地区南下，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未曾间断过。战国时期羌人部落的一牦牛种是沿着他们祖先的足迹南迁的，川滇“大墩子——礼州遗址”中强烈的氏羌文化色彩即可证明他们的祖先远在三千多年前就到达四川南部和云南北部。

在滇西北和云南另外一些地方的民族传说中和风俗习惯上，亦可找到大量与古代氏羌有关的痕迹。普米族传说他们的祖先原来住在甘肃、青海一带，后来沿横断山脉南下。又如，纳西族在为死者举行宗教仪式时，由东巴念经送死者的灵魂到祖先居住的地方，方向是往北送，送过金沙江北岸后还要到很远的地方。丽江纳西族又传说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一个叫“多弥”的地方迁徙而来。而“多弥”就是今天的青海省玉树州通天河一带。古代氏羌行火葬，《吕氏春秋·义赏篇》：“氏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不焚也。”在青海循化发现过卡约文化的火葬墓，而云南彝、白、哈尼、纳西、拉祜等族的传统葬俗是火葬。在彝文中，还有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陶器刻符相似的文字，仰韶文化中彩陶盆上很多大幅鱼纹，可能为氏族徽号或图腾崇拜物。而西藏藏族至今禁止食鱼与仰韶文化的鱼图腾崇拜应有一定关系，凉山彝族现在生产的许多漆器，从花纹上看颇似马家窑文化的彩绘木碗。

按《史记·西南夷列传》的划分，如果将云南古代民族分为西夷和南夷。西汉沈黎、越嶲、益州三郡是西夷分布区，也是滇西北，洱海及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的分布区。滇西北地区新石器文化是氏羌族系的先民创造的；洱海地区和金沙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以氏羌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也有百越文化因素（稻作文化），是氏羌先民南下和当地土著居民（百越系先民）共同创造的原始文化。

其次，再考察与百越族系有关的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

从杭州湾海岸线至北部湾，到云贵高原这一个广阔的半月形地带，在先秦时期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南方族群——百越。《汉书·地理志》：“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云南古代也是百越居住地区。

在考古学上，百越及其先民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有，陶器组合有鼎、豆、壶共存，陶器夹砂或夹炭粗陶，以拍印绳纹为装饰，石器有双肩石斧、有段石镞，居住干栏和种植水稻。

有肩石斧（双肩石斧）以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土者时代最早、数量最多。发现有肩石斧的早期遗址，又大多数有西樵山遗址的产品，西樵山遗址是我国有肩石斧的起源地之